

● 传统安全篇

伊斯兰国会被消灭吗？

“伊斯兰国”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瞬间演变为声震全球的极端组织，始于今年6月的“壮举”：攻占伊拉克摩苏尔、提克里特，直逼巴格达。西方媒体惊呼，这是“9·11”本·拉登后恐怖主义新标志。与碎片化的“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具有远大“抱负”。它宣称，其目标是要消除战后中东国家边界，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5年内要占领西亚、北非和中亚以及南亚一些国家。

美国已经发动N轮空袭，并组建了全球反恐联盟，但却没从根本上撼动“伊斯兰国”的根基。2015年，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实行现行举措，“很难消灭该组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判断。

“首先，美国不愿在中东加大反恐投入。”田文林分析，数年来，奥巴马一直谋求从中东脱身。“重返中东反恐”与奥巴马此前的外交政策方向背道而驰，由此决定了奥巴马对打击“伊斯兰国”始终心存抵触。

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反恐阵营虽庞大，其实并不给力。伊拉克安全部队饱受教派矛盾、贪污腐败、装备给养等困扰，战斗力很弱。约旦和沙特等海湾国家国力薄弱，根本无力与“伊斯兰国”正面对抗；埃及国内问题成堆……“地区反恐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对‘伊斯兰国’构成实质威胁。叙利亚和伊朗反‘伊斯兰国’意愿最强、军力也相对强大，但美国却将其排除在联盟之外。”田文林说。

另外，“如何突破‘反恐投入越多、留下的烂摊子越大’的困局”，美国也是心中无底。当年，美国倾其国力在中东反恐，但极端恐怖势力反而更趋壮大。“这表明，在反恐问题上，‘高投入不等于高效益’，甚至可能‘越反越恐’。但仅靠当前的‘轻脚印’反恐战略（包括无人机反恐，动用特种部队进行精确打击等），很难对‘伊斯兰国’这种‘升级版’的极端组织构成致命打击。”田文林分析。

日本会否成为亚洲的麻烦

日本与邻国的外交困局很大程度上源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系列右倾化的举动。最近，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也让人们对日本能否实现转变表示了怀疑。

“除了防卫相以外，安倍内阁成员维持了大选前的原班人马。”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教授观察：“这表明，安倍首相将继续推行他既定的内外政策方针。”

这种既定方针其实有着清晰的路线图。2015年上半年将强力通过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相关法案修订，实质上突破宪法限制，增强海空力量。下半年将争取连任自民党总裁，建立安倍长期政权。在外交方面，安倍首相可能首访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寻求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网络安全合作。

“修宪”是安倍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引发国际社会反对的一个诱因。“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尚未超过参议院2/3以上的多数议席，安倍2015年尚难实现修宪目标。”刘江永分析。

在今年11月中日达成“四项原则共识”之后，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隐患”并未消除。“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否会视中国为“威胁”？日本是否会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掩护下，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幌子对外军售，特别是对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军售，给中国制造“麻烦”？

“如果安倍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安全保障问题上无视中日之间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的精神而我行我素，中日关系不仅难以有根本改善，甚至还会出现倒退。”刘江永说：“安倍曾表示在战后70年要发表谈话。其是否承认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给亚洲邻国带来巨大损害，表示反省和道歉，值得关注。”

乌克兰能摆脱危机吗

布热津斯基早在《大棋局》中就把乌克兰列为地缘政治轴心国。“亲欧”还是“亲俄”始终是摆在乌克兰领导人面前的艰难选择。北约需要乌克兰成为其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关键力量，而俄罗斯则认为乌克兰是阻挡北约入侵的战略缓冲地带。

从街头抗议，到总统“跑路”，再到克里米亚独立，东部“独立建国”，乌克兰国家内部政治对立，领土分裂。这种危机也外溢至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新冷战”。

2015年，乌克兰仍是一个热点。“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能否发挥作用？俄罗斯是否会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压力下屈服？乌克兰能否认识到俄罗斯在其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西方与俄罗斯能否通过和谈寻求妥协之道？”中国社科院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认为这些因素是影响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因素。

目前，西方以制裁手段迫使俄罗斯就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乌克兰的政治精英能奉行‘左右逢源’的策略，兼顾西方和俄罗斯的利益，西方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利益冲突才能得到缓解。相反，如果乌克兰力图通过加入欧盟和北约来抵御俄罗斯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如意算盘只能激发俄罗斯更大的不满，使乌克兰危机更为难以解决。”何卫说。

利马的气候谈判在艰难中达成妥协，但却给2015年的巴黎大会留下了未解的难题，中美之间已就减排达成了共识，两个大国间的妥协能否给来年带来福音？复杂的世界运转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不安，对未知的恐惧使人们寻找安全感。为此，本版年度策划把主题定义为“安全”：传统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人类自身的安全。

预测不是做结论，而是依据专业知识给读者呈现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让这个不安的世界变得有迹可循。

作者的话

2014年，即将过去的一年。年初的时候，基辅的民众不会想到，自己表达“亲俄”、“亲欧”立场的街头抗议会引发持久的动荡，国内的危机外溢为俄美之间的“新冷战”博弈。

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危机已经造成了中日之间的“僵局”，日本对战争罪行的否认也让其在东北亚面临外交困境。

“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2014年极端组织的“黑马”，比“基地”组织更有雄心且更有战略，引发各路追随者兴风作浪，对原有的民族—国家组织架构形成了巨大冲击。

2014年新年的头几天，莫斯科百姓手里的卢布还有些购买力，临近年底，已经贬值近50%，而价格都涨得厉害。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的退出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巨幅震荡。

埃博拉病毒早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熟知的存在，今年在西非三国的肆虐让其成为令人谈虎色变的東西。

利马的气候谈判在艰难中达成妥协，但却给2015年的巴黎大会留下了未解的难题，中美之间已就减排达成了共识，两个大国间的妥协能否给来年带来福音？

复杂的世界运转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不安，对未知的恐惧使人们寻找安全感。为此，本版年度策划把主题定义为“安全”：传统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人类自身的安全。

预测不是做结论，而是依据专业知识给读者呈现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让这个不安的世界变得有迹可循。



为这动荡世界寻找安全

本报记者 杨子岩

● 经济安全篇

发展分化成世界经济新常态

站在2014年年末，路透社用“脆弱”来形容今年全球经济的表现：中国经济的减速、欧元区经济增速疲软、新兴市场中俄罗斯卢布大跌。如果再加上有影响力的事件，那就是国际油价大跌。

欧洲有的经济学家概括“我们又面临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和新一轮全球经济颓势的风险。”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用当下的热门词汇“新常态”来形容2015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状况。

“发达国家经济体总体上仍然处于低速复苏新常态。美国经济受产业结构调整 and 出口带动，会继续领跑西方经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将平稳增长。”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预测。

但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刺激性复苏结束，调整性回落

开始，趋势性增长未到，世界经济正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各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危机后遗症难根除，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人口普遍老龄化，全球中短期内难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生产率普遍下降，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与动力。”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

2015年，发展分化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发达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将开始提高政策利率；欧洲和日本经济继续低迷，继续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也保持增长态势分化，中国和印度将继续中高速增长，而俄罗斯、巴西等将出现衰退或零增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说。

新兴经济体应防范风险

风险，风险，在市场上，能够避风躲浪的永远是强者，弱者只能随着大潮大浪的涨跌而听天由命。12月18日凌晨，美联储的会议决议发出暗示：可能在明年加息。

这无疑会加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去年6月份至8月份，美联储减少购债规模的决议让各国出现了明显的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债市下跌。

这一幕已经在俄罗斯上演，在西方联手制裁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之下，卢布直线下跌。一年内，卢布已经贬值50%。其他新兴国家的货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大幅贬值。

“2015年美联储将择机加息，美元将因此持续走强，由此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大宗商品尤其是油价长期走低，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增长减弱、金融不稳。”陈凤英分析。“这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更多不确定因素。”

除了受美国加息的影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如下主要下行风险：全球需求继续不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甄炳禧说。

国际清算银行（BIS）指出，美元的强势正在对新兴市场 and 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收紧形势只会恶化。

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甄炳禧给出了如下策略：“新兴经济体应该根据自身面临的现实挑战，采取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保增长’目的；坚持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夯实长期发展基础；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合作，通过扩大‘南南合作’，促进新兴经济体经济稳步复苏。”

可以肯定的是，“2015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两个驱动轮当为中美两国。中国海外投资会翻倍增加，‘一带一路’战略初见成效，对世界经济会发挥突出拉动效应。”何茂春预测。

气候谈判或有实质进展

某媒体在一期关于气候大会的节目中打出了这样的标题：《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我们能够乐观吗？》这种设问方式本身就带有一种怀疑。

这种怀疑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减排与发展的矛盾，国家之间的分歧，一直是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主要障碍。

此前，原定2009年完成的“巴厘路线图”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和2010年坎昆大会上均未能达成一致，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不得已将谈判期限延长到2015年，各方同意在2015年底的巴黎大会上达成协议，以取代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换句话说讲，巴黎大会是“最后的机会”。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却对气候变化的前景感到乐观。当然这种乐观并非盲目，而是有所根据。

11月12日，中美两国在北京联合发表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美国则承诺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



医务志愿者在利比亚首都实施医疗救助 来源：中新社

于气候变化的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美国则承诺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此举标志着多年来陷入僵局的国际气候谈判出现了重大转折，有望在明年年底的巴黎峰会上达成一项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

英国媒体在发表的社论中说，中美两国的声明为原本毫无希望的气候变化大会注入了希望。在之前的10月24日，欧盟也公布了自己在巴黎大会上的碳排放目标——到2023年，总排放量较1990年降低至少40%。

“巴黎气候大会是对2020年以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设定减排目标的一种安排。目前从大国的表态来看，对明年达成重要协议的目标还是很有信心的。”何建坤说。“中国带头减排，既是国内需要，又是国际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既保障了未来全球的生态安全，又保障了国内能源供应安全。”

反思谁制造了埃博拉危机

现代技术的进步，让航天器都载着生命飞上了天，但在应对传染性病毒方面，人类却屡屡栽了大跟头。

据路透社25日报道，曾帮助发现埃博拉病毒的科学家彼得·皮奥特表示，此次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危机很可能要持续到2015年年底。

世界卫生组织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暴发于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已导致19497人疑似或确诊感染，其中7588人丧生。

埃博拉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词。首例个案早在1976年就被发现，此后偶尔在几个非洲国家暴发过。“目前已知的五种埃博拉病毒株中的4种，动物寄主都来自于非洲。这就是为什么埃博拉一开始就和非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方介绍。

这场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疫情，由于一开始并未得到国际机构的重视和实施应有的防治措施，而使危

机更进一步一发不可收拾。

更可怕的是“简单地把‘埃博拉等同于非洲’的单面认知，潜在地影响了当地和国际社会在非洲干预危机的方式”，刘海方说：“长时间内，把埃博拉绝对妖魔化的宣传，让‘隔离’这种措施被视为唯一的有效措施。”

西非三国的公共卫生危机，被妖魔化为整个非洲的灾难，这让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的南部非洲也深受其害。旅游者在8月份时就感叹：“埃博拉又把非洲囚禁成了孤岛，与其他世界隔绝。”

“一位来自疫区的利比里亚同学激动地说，最需要的措施是及时给予受感染人物资和心理上的护理以及长远的防疫知识”。刘海方说，我们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全球危机面前，怎样摒弃前嫌，通力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还有地域歧视，这也许是深入人心的视角。”

● 人类自身安全篇



来源：华尔街人